

SAATLERİ

时间调校研究所

AYARLAMA

阿赫梅特·哈姆迪·唐帕纳尔

ENSTİTÜSÜ

谭琳 译

AHMET HAMDİ TANPINAR

SAATLERİ

时间调校研究所

AYARLAMA

阿赫梅特·哈姆迪·唐帕纳尔

ENSTİTÜSÜ

谭琳 译

AHMET HAMDİ TANPINAR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时间调校研究所/(土) 唐帕纳尔著;谭琳译. -上海: 上海文艺出版社.2016.4
ISBN 978-7-5321-5723-5

(土耳其当代文学丛书)

I. ①时… II. ①唐…②谭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土耳其-现代

IV. ①I34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059490 号

SAATLERİ AYARLAMA ENSTİTÜSÜ by Ahmet Hamdi Tanpınar

© Ahmet Hamdi Tanpınar, Kalem Agency

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:

2016 Shanghai Literature & Art Publishing House

All rights reserved.

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: 09-2012-475 号

This project was undertaken with the financial support of TEDA.

本项目得到土耳其文化、艺术和文学推介会资助。

出品人: 陈 征

责任编辑: 曹 晴

封面设计: 胡 斌

时间调校研究所

(土) 唐帕纳尔 著 谭琳 译

上海世纪出版集团

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

200020 上海绍兴路 74 号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

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ewen.co

上海华教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14.5 插页 2 字数 345,000

2016 年 4 月第 1 版 201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1-5723-5/I • 4565 定价: 47.00 元

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

T: 021-66243241

第一部 巨大的希望

认识我的人都知道,我对读读写写这类事没有太大兴趣。若是不算上小时候读过的儒勒·凡尔纳以及《尼克·卡特》系列小说,我的全部阅读量不过几本历史书籍,书中还有一大堆源自波斯语和阿拉伯语的词汇,读得磕磕绊绊;再就是《鹦鹉故事》这类书,或者一些出自《一千零一夜》的童话了。后来,我们研究所成立前那段日子,我在家无聊之际,偶尔会翻翻孩子们的教科书;有时在埃迪尔内卡普或是泽扎德巴希的咖啡馆里闲坐,报纸四处摊放着,日脚悠长,闲来无事,也就索性埋头扎进报纸堆,读一读连载小说和报上的各类文字。

等到我去法医学院接受观察,我的读物中又加上了拉米茨医生撰写的心理分析研究报告。拉米茨医生负责我的治疗工作,后来的事情也证

明,他的确算得上我生命中的一位贵人。为了恰到好处地表示自己对此这么深奥这么有学问的东西感兴趣,我逐字逐句阅读了他所有的著述,一行不漏。这些作品,涉及的都是相当重要的主题,篇中典故我也一直不甚了了,它们也未见得如何大大提升了我的文学和思想修养。同拉米茨医生的交谈总是那么漫长,一般都是他说,我听着;读这些东西的唯一作用,就是在谈话中掩盖我的无知。一个人在童年时从家庭教育中学到的东西,一辈子都不会忘记。我父亲一直坚持,我们在启蒙的年纪应当首先学习阿拉伯语,然后再念学校的课本,这就足够了,完全不必读什么**杂七杂八**的东西。恐怕正因为他如此严格的审查,或者说限制,导致日后我几乎本能地拒绝任何一种读物。

尽管如此,我一生中还是有幸得到这样一个机会,自己来创作一部微不足道的作品。然而,我写这本书的初衷并非出于某种热切的渴望,急于表达自我,我向来讨厌这副模样,我可不是想就此向众人宣告:“大家注意啦,我们的海利·伊尔达尔自己写了一本书!”但也不是由于自己内心有什么压力,除开写本书之外,别无其他方法排遣。这部作品的出版方是研究所,正好在这段时间里,我们的研究所关门大吉;或者,说得更准确一点,由于哈里特·阿亚希及时介入,研究所目前已经转入持续的解散状态。有一点请允许我强调一下:这样一本书,旨在记录和描绘所有钟表制作匠人的老祖宗,赛耶·阿梅特·扎玛尼的工作和生活,我写作的兴趣与动机,首先必须归功于哈里特·阿亚希,他的援手于我大有裨益。他是我们研究所的创始人,是我的大贵人和亲密朋友,正是在他的帮助下,我从一无所有走到今天,成了个人物。总之,降临在我生命中的一切好的、美的、有益的东西,都应当感谢这个了不起的人,他在三星期之前因为车祸离我们而去了。哈里特·阿亚希凭一双慧眼,从我记叙钟表匠穆法基特·纽里·埃芬迪的文字(我曾经在他那里做过工),还

有我发表的有关钟表制作技艺的这样那样的论述中，突然发现了赛耶·阿梅特·扎玛尼的身影；这一发现的重大意义绝不亚于研究所本身；更何况他还马上判断出，扎玛尼曾经生活在苏丹穆罕默德四世年代，俨然有十足把握。这些，都足够证明他对本书的贡献。

以上两条重要发现，也为我们的时间庆典提供了基本依据，自那以后，我们开始热火朝天地组织时间庆典活动。我的著作被翻译成多种语言，在国内外引发了相当广泛而严肃的讨论，仅此一点，就已经能够说明，赛耶·阿梅特·扎玛尼曾生活在哪个世纪，还有，这个人归根结底是否曾经存在，在这两个问题上，我辞世的好友哈里特·阿亚希并没有误导大家。对我个人来说，尽管这部作品的基本思想并不是我自己的，但它还是署上我的大名，被译成十八种语言，并且在报刊媒体上获得广泛评论，甚至最后还让范·洪博特这样的博学之士不畏路途迢迢，从遥远的荷兰赶来，就为了当面结识我本人，并且顺道瞻仰赛耶·阿梅特·扎玛尼之墓，这一事件，堪称我整个人生的巅峰。

不过，瞻仰墓地的过程中还是出了点状况。同一位外国科学家探讨如此艰深的话题，即便有翻译在场，也实在并不轻松；况且要找到一个人的墓地，这个人无论在过去还是未来都根本不存在，这或许比有些人能够想象的更加困难。头一个难处，倒是多亏报纸上总喜欢这样描述我们，“态度无拘无束，自由随意，堪称热情过分”，无形中帮我应付过去了。而在第二个问题上，我们的祖先使用别名的习惯，对我来说，简直就是及时雨。

当时我想，要是在埃迪尔内卡普、艾玉普或者卡拉贾阿赫梅特的巨型公墓里兜上几圈，只要转悠的时间够长，早晚总能找到一个坟墓，主人名叫赛耶·阿梅特·扎玛尼。事实上的确也是如此。对某位逝者的身份作一点小小的修饰，这个事情我心里并没觉得有多么过意不去，毕竟

此人的坟墓最终得以修葺一新，他也因此名扬天下，妇孺皆知。名声，有可能招致堕落和毁灭，不过也意味着幸运和收获。这个基地的照片，从荷兰传到全世界的报纸上，照片上始终能看到我的身影，一手扶着墓碑，另一只手里拿着帽子和大衣。

如今回过头来想想，其实只有一件事，我觉得心中有愧，范·洪博特的确为我的书写了不少溢美之词，是他让我在全世界出了大名；而且连续数日，我们同行同止，但我终究还是没有松口，同意让他倚着那块墓碑留个影。每回他向我提出这个要求，我总说：“您毕竟是一位基督徒啊，这样做，会惊扰逝者的安宁！”我顶多容许他站在我右边摆个姿势。不过，这到底也算不上什么十恶不赦的事。最后这家伙让我好几个月不得安宁。真是活该！本来嘛，为什么非要去打扰素不相识的人呢？我们最好都为自己活着，彻彻底底，孤家寡人，这才是最适合的生活方式！可是就这点小事，后面你们会看到，范·洪博特日后是如何报复我的。

无论阅读还是写作，都无法给我带来愉悦的感受。但是今天，我还是一早就坐在这里，面对着一本大大的笔记簿，动笔记下我的回忆。我今天五点钟就起身，比平素起床的时间早得多。家里的女佣、厨子、管家都还睡着。我的厨子阿里夫·埃芬迪，可惜不是来自美食之乡博卢，不过他做的菜很过得去；还有女管家泽内普，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她雇来，目的就是给我们的大宅增添一抹高贵讲究的调调，说来也怪，我小的时候，有很多黑人生活在伊斯坦布尔，而如今雇用黑人，几乎全要靠进口了。长话短说吧，所有人，所有靠自己的双手劳动，为这座钟表庄园尽心尽意，添砖加瓦的人们，现在都还在睡梦中。不管乐意不乐意，早晨这杯咖啡好歹我都得自己煮。忙完之后，我在靠背沙发椅中坐定，开始思考我的人生，先从种种往事中过滤出应该遗忘的、无须理会的，或是必须修改粉饰的，然后着重考虑那些无论如何都值得一书的事情。简而言

之,我花了许多心思,在脑海中努力给一些事件排队,此刻,我的首要原则就是忠于事实,在撰写一篇文章,或者构思一部回忆录的时候,不管怎样,这是必须做到的。

我,海利·伊尔达尔,首先捍卫的就是绝对真诚,坦坦荡荡。要是一个人不能坦然地公开地谈论一切,那他写这些东西又有什么意义呢?不过,即便是绝对的真诚坦率,也需要事先挑选整理,过过筛子。完全按照事情发生的具体过程来叙述,把一切原原本本地呈现出来,这是不可能的,这个我想您一定也会同意。要想避免记叙总是中断,就必须给文章划分清晰的段落,并且精选出某些重点,在这些重要问题上争取与读者达成共识。坦诚,终归不仅仅是某一个人自己的事,毕竟还涉及其他方方面面。

不过,您可不要以为,我把自己看得有多了不起,拥有多么非凡的生活经历,值得大书特书。对于这一点,我并不曾赋予它超出实际情况的更大意义。刚好相反,我一向认为上帝把生命赐给众生,并不是为了让大家记录它,而是要让人们利用它,尽量好好地生活。书面形式反正本已存在,我们的命运,早就写在上帝那本大书之中了。

不,对我来说,记下回忆,目的并不是复述一遍我自己的故事。我只是希望,作为某些不寻常事件的见证人,自己能够做点什么,避免让这些事完全被人遗忘。我的另一个初衷,则是想要通过手中的笔为那个了不起的人树碑立传,三星期前,我们刚将他送往墓地安葬。

我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,照我妻子在研究所成立前的一贯评价,世界上最冷漠、最无动于衷的一个人,能够结识一位确实如此出色、生来就具备天赋创造力的人物,何其幸也。我有幸与他相处多年,随时观察他工作的情形。我亲眼目睹各种想法在他的头脑中如何扎根,如何像一棵蓬勃生长的树,逐渐占据他的身心,又从那里流入整个生命中去。

我有幸在最靠近他的地方,与他共同经历了我们时间调校研究所创办发展的全过程;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庞大、最有用处的机构,它最初只是突然在他双眼中闪烁的火星,而终于发展到今天的规模,或者说得更确切一点,昨天的规模。若不是要故作谦虚,我甚至可以放言,我这个可怜的海利·伊尔达尔,尽管浑身都是毛病,但就凭着一点好运和偶然的机,在这个研究所的创办过程中,也得以扮演了一个不能说不显赫的角色。

如实记录下我的所见所闻,于我来讲,似乎是对下一代不可推卸的某种责任。除了我之外,唯一比我清楚如何才能更好地记述我们研究所故事的那个人,如今已经令人扼腕地离世而去。昨天晚上,我又一次看着我们餐桌旁那个空荡荡的位子。我妻子眼中噙着泪水,注视着那张空空如也的椅子,她的模样一直在我眼前,拂之不去。她周围的一切仿佛变得陌生无比。最后,她终于忍不住了,用餐巾抹去眼泪,匆匆起身回房。我敢肯定,她哭了一整夜。说句公道话,哈里特·阿亚希不仅是我的恩人,亦是她十分亲近的朋友。她的适度悲伤也成了促使我下决心的一个小小原因,我决定动笔,写下眼前的这些文字。

躺在床上,我沉吟良久,仔细思索着关于“海利·伊尔达尔”这个人的事情。我想:“你见多识广,经历过许多事。在你不到六十年的生命中历经的种种,怕是能够填满很多次人生了。在遗弃和困境中生存,这意味着什么,你已经尝尽了那种苦涩滋味。后来你又身手敏捷地攀上了成功的阶梯,飞黄腾达。那些从前完全没有力量做到的事情,居然一下子就唾手可得,全不费工夫。这一切,都必须彻彻底底归功于哈里特·阿亚希。是他把你从困窘的泥潭里解救出来。是他,把你那些那些纠结不安,那些一直妨害你的生活、你的思想,妨害你获得灵魂宁静的偏见,最后都变成了幸福快乐。在此之前,你在自己周围看到的无非是贫穷、困难和种种丑恶现象,是他令你感受到生命的乐趣和美好,这些人类本

拥有的东西。从此你才有能力去领悟人类灵魂中高贵的一面。他还教会你领略家庭中的幸福感。你的妻子帕奇泽真正的面貌，正是哈里特·阿亚希首先展示给你看的。再者，你从前总是以为，你的孩子们无非是老天的产物，是上帝送来惩罚你的，又是你的恩人施加影响，令你再度醒悟过来，认识到能拥有一个父亲的身份，是多么大的福分。难道你不应该做点儿什么来表达你的尊重和珍视，来纪念你这位心地善良，丝毫不夸张地说，可以称得上了不起的朋友吗？难道你就这样听任他被人彻底遗忘，甚至被人嘲弄，蔑视和诽谤中伤吗？还是再好好想一想吧，认识哈里特·阿亚希之前，你的生活是什么样子，而如今你又变成了什么样子！回忆一下你在埃迪尔内卡普的寓所，想想那些日复一日敲门的债主，还有你徘徊在外面大街上躲躲藏藏的模样，想一想为了每块小面包苦苦奋斗……再想想你今天拥有的幸福和安乐吧！”

二
一

我的生活,这里指的是我认识哈里特·阿亚希之前的生活。可是,那难道能真正称之为生活吗?好吧,要是有人理解的生活,就是一切都匮乏,除了忍受不断被人轻视,每时每刻都能感觉到羞辱之外,别的什么都没有;身上绑着一件给疯子穿的紧身衣,在里面烦躁不安,却从来无法挣脱:要是这样的话,那完全可以说,我和我的家人曾经就是这么活着,最接近这种状态。不过,如果生活也应该同样意味着人还可以享受一些权利的话,比方说,快乐在一个人心里绽放;比方说一个人能够针对外部世界,有一点微末的安全保障,而且与他周围的人可以平等相待,那情况就马上不同了。请您注意,我还根本没有提及,当人们专心致志地做某件事,并且对他人有益处的时候,自己能感受到的那种快乐。在我认识

哈里特·阿亚希之前,我根本就不知道这世上还存在这样的快乐。如今完全不同了,我的生活有了一个目标。现在的我心里很清楚,我要为这个世界留下点什么,让人有朝一日能够记得起我。整整十年之久,我在这个全世界最现代、最重要的研究所任职副所长。这段时间里,我不仅设法为我的孩子们、我的所有亲眷和整个朋友圈子谋得工作,帮助他们过上富裕日子,甚至还同样帮助了早年曾经轻慢我的那些人,要知道这种事当年可时有发生。随便提些事实就足以证明这一点,仅仅通过在苏阿迪耶地区建立起来的社区,我们就对市政建设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。在这个社区里居住的,全部是我们研究所的工作人员,他们当中有一半人,本来就是我和哈里特·阿亚希的亲戚,那些人在研究所刚创办的时候就投奔而来;更何况他后来还作了个决定,并且一直坚决执行,那就是在较高的职位上,以相同比例安排我们的亲属,还有那些身居高位者推荐给我们的人。

我自己有点犹豫,不知道现在应不应该在这里提到那些激烈的批评和指责,早在研究所解散之前很长时间,我们就已经饱受媒体的非议,之后更是愈演愈烈。生活不是很奇怪吗?那些记者们,十年前还交口称赞我们,把我们这个包罗万象的组织描述成整个世界的典范,当然,这本身就是我们一直努力的目标。这些记者当年曾经对我们那么友好热情,蜂拥而至参加我们举办的鸡尾酒会和媒体发布会,可是到了今天却争先恐后,迫不及待地要用手中的笔把我们置于死地。

首当其冲被大肆诟病的,是我们研究所的规模。他们认为我们是个完全多余的机构。仿佛在这样一个承受着高失业率的国家里,给这么多人带来工作和面包,是件不值一提的小事。我们不断面对这样的指责,他们说,三位所长,十一位部门领导,四十七名女秘书和二百七十名检查员,数量太庞大。然后又来嘲笑我们给各个独立部门想出来的名字,就

好像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实——时钟,难道不就是由一根分针、一根时针、一根秒针、一根发条、一个平衡轮、一根轴芯组合起来的吗?我们称之为时间的玩意儿,难道不是由小时、分钟、秒和几分之一秒构成的吗?他们下一个嘲讽的对象,是所有工作人员的培训过程、专业知识和业务能力,要知道,我们的员工都是从最基本的知识和技能学起,十年来,他们的能力完全在工作中得以证明。最后,有人还对我们的出版物大肆指摘,不留丝毫情面。

他们肆意批评我们所有的出版物,毫不顾忌口德,首先是我的作品《赛耶·阿梅特·扎玛尼的生活与事业》。然后就轮到几分之一秒部门的负责人,我的一位妹夫悉心整理出版的《宇宙钟表调校中西南风的作用》,我朋友拉米茨医生所著的《钟表显示的时间与心理分析》《钟表性格学的伊尔达尔方法》,还有哈里特·阿亚希的著作《社会一元论与钟表》,以及《秒和社会》——这些书,每一本都被加上最荒谬的大标题,展示在各大报纸的头版,仿佛题目下要谈的,是世上最可笑,或是最危险的作品。

就这样还不算完。最后,有人把审查的放大镜对准我们的综合罚款现金支付系统,该系统的运作手段包括双倍押金、附加费用、折扣制度和奖赏规定。这一系统给我们这个城市的居民们带来如许快乐,得到了如许消遣,也大幅度减轻了研究所的科研和社会工作负担。可是,他们却直截了当地指控我们伪造证件,以及欺诈。该系统的诞生始于哈里特·阿亚希和我妻子帕奇泽两个人下西洋双陆棋,游戏的规矩是双倍赌注,他们没完没了地下,我在一旁,百无聊赖中构想出这个系统,此想法一经引入,人们当即欢欣鼓舞,狂热接受。

一位财政部门的高级官员对我的罚款系统给予极高评价,甚至将它

列入财政金融史上最伟大的发明之一，并且自此之后，一口气将我与杜尔哥^①、内克尔^②和沙赫特^③这样的大人物相提并论。

某种程度上，这位财政官员并未言过其实，因为一直以来，只要在财政税务方面给大众增加一丁点负担，基本上总会激起不满情绪，尤其是采用罚款手段的时候。而我们的罚款现金支付系统则完全颠覆了以往的做法。犯错的人，一旦被指出违反规定并面临惩罚时，他的第一反应肯定是吓一大跳，不过，只要他随即认清，这套系统背后隐藏的逻辑确实令人心服口服，脸上就一定会绽出微笑；而只有当他深刻理解到此事的严肃用意时，才会真正报以会心的笑容。当时，我们引入这套系统最初几天，总有人不断跑来对我们的工作人员说：“啊呀，请您务必顺道上我家里来一次吧，无论如何也得让我妻子了解一下这套系统，这是我家的地址。”有的人递上名片的同时，还把相应的出租车费硬塞到我们工作人员手里。

我们的现金罚款系统基本原则如下：任何一块钟表上显示的时间，如果与公共场合，或是其他地方的某件钟表显示时间不一致，就必须缴纳五个库鲁什^④的罚款。要是被罚的钟表还与其他更多钟表上的时间显示有出入，则罚款加倍。涉及多个钟表的罚款赔付，罚金数额甚至呈爆炸性增长。要想精确地测定时间，本身就是件完全不可能做到的事，所以检查一次，就能敛得数目不菲的罚金，尤其在那些人气旺的地段。

除此之外，我们还把钟表的快慢也纳入这个复杂的计算模式当中。

① 安·罗伯特·雅克·杜尔哥(Anne Robert Jacques Turgot, 1727—1781)，法国古典经济学家，重农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。

② 雅克·内克尔(Jacques Necker, 1732—1804)，路易十六时期法国的财政总监，银行家。

③ 亚尔马·贺拉斯·格里莱·沙赫特(Hjalmar Horace Greeley Schacht, 1877—1970)，德国经济学家、银行家、自由主义政治家，德国民主党联合创始人。

④ 库鲁什(kuruş)，土耳其货币名，一库鲁什等于零点点一土耳其里拉。

众所周知,一块表,总的来讲,不是走得快,就是走得慢,基本不存在第三种情况,除非有哪座钟哪块表彻底停了,纹丝不动;这就和时间无法测定的特性一样,也是一条普遍适用的规律。然而,这当中还牵涉到个人因素。人,天生就要控制世界,而据我观察,人同时也听命于周遭事物。我还是个小孩的时候,大概是阿卜杜勒·哈密德时期^①,当时,我们的社会状况相当糟糕,令人沮丧。从苏丹的面部表情开始,沉闷压抑的情绪如潮水一般蔓延,最终自动笼罩整个世界。我的每一位同龄人一定还能清晰地回忆起当年,城市轮船汽笛鸣响,传递的是一声声强烈的悲哀。十分滑稽,今天我们再听到轮船和电车的声音,感受却天壤之别,周遭情况好转,汽笛声给我们带来的是欢欣喜悦的笑!

在钟表问题上,其实也没什么不同。凡事都要看它的拥有者,个性如何,心态怎样,要看他们的婚姻生活状况,乃至他们的政治信仰,钟表会无意识地调整自己,来适应不同情况。我们的社会,目前正承受着意义深远的改变,这变革来得快捷,迅猛。在飞速疯狂的发展过程中,好几代人,很多阶层都被丢在身后,这样一个社会里,影响最大的,自然是上述最后那个因素,也就是政治态度。不过,一旦牵涉政治意见,人们经常会因为这样或那样的缘故,更愿意把想法隐藏在心里。法律制裁的手段层出不穷,在这类威胁下,自然不会有人站出来大吼一声:“我的想法是如此这般。”也有可能,他会在一个隐秘之处发出这样的呼声。而有一个地方,就特别能够显示隐蔽性,表现出个性和信仰的差异,这就是钟表。

钟表,作为主人最亲密的伙伴,照管着他的心跳,贴在他胸口,与他分享每一次兴奋、悸动和不安,仿佛被他的体温温暖着,与他融为一体;

① 阿卜杜勒·哈密德二世(II. Abdül Hamid, 1842—1918),奥斯曼帝国苏丹和哈里发(1876—1909在位)。